

军事化学

解放军出版社

徐长安 刘宝村 陶军 尚伟 著

全国第一本把军事文化

作为一门学科

研究的理论专著



军事文化学

徐长安 刘宝村 陶 军 尚 伟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事文化学 / 徐长安等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5065 - 5697 - 2

I. 军… II. 徐… III. 军事 - 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E2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0262 号

书 名: 军事文化学

作 者: 徐长安 刘宝村 陶军 尚伟

责任编辑: 王世光 闫永春

装帧设计: 闫可钦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0

印 数: 5000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5 - 5697 - 2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一

文化学和军事文化学若干问题札记

毕文波

1997年，海潮出版社推出了徐长安教授的专著《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我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序言中，希望著者能够着眼于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作为一个专题纳入后续研究计划。令人高兴的是，不到十年功夫，他和几位年轻学者刘宝村、陶军、尚伟果然又磨出了一把剑——《军事文化学》。这本新著不仅设置了当代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建设专章，而且凭借国内外大量相关成果和他们自己的独立思考，首次尝试构建军事文化学这门新的学科。尽管它也许还需几番砥砺，然亮色可睹，值得祝贺，更乐于再提供一份札记，聊以代序。本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我都是赞同的，读后颇受启发。这篇札记包括对书中某些内容所作的评说，也包括若干补充意见，供著者和读者参酌。

其一，因何感悟而引起“文化”概念的产生？

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又“走出”了或“超越”了自然界。这首先归功于大自然的伟大的运动，归功于伟大运动中的伟大的孕育，也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归功于人类自身依托于自然孕育的自我创造。自从人类这个骄子从大自然母亲的分娩中呱呱

坠地之后，便逐渐产生了一种对于“关系”的感悟：“我”同周围的事物和世界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区别？“我”是谁（当然不是说类似的问题人类祖先能够作出如此明白的表述，而是说实际上有所触及）？此般感悟是人类之外的任何自然物（包括其他灵长目动物）都没有的。这也就是后来哲人们所称的“主体”意识或“自我存在”意识的前身。不知经过怎样漫长的岁月和艰难曲折的历程，这种感悟逐渐提升为较为正规的理智的思索和概念，这种概念又逐渐由朦胧而清晰、由片面而全面、由肤浅而深刻、由荒谬而正确。这些同一序列的概念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社会”、“实践”和“文化”。“文化”之于“社会”和“实践”既有严格的、不容变更的逻辑顺序，同时又相互规定、相互诠释、不可分离。如果说，“社会”是“主体”存在的组织结构形态，“实践”是主体存在的活动方式，那么“文化”则是主体在其存在的一定组织结构中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活动的结果。由此三者，人类便确定了自己在宇宙间的位置。有学者认为，文化“是与自然（按：即“纯自然”）对立的观念”^①；“‘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②。这表明人类社会诞生之前，自然界（宇宙间）没有文化；文化首先与人相关，进而意味着组成社会的人作为主体并以自然作为客体而产生的关系亦即生产实践，同时再衍生出其他。^③其中特别需要指明的是，返求诸己，所谓“人化”必然也在于社会的改造，还在于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大写的“人”。的确，总体说来，人类对于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的感悟与

① 李河：《文化研究的对象、历史和方法》，《哲学研究》1986年第4期。

②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③ 有一种猜想，说是宇宙间存在着发达程度相当于甚至高于地球人的某种物类。假若真是那样，也只是将“人”和“文化”的外延予以扩大，即包括与该物类同一含义的地球之外的“另类人”和“另类文化”。这与此间讨论的问题并不抵触。

“主体（自我）存在”的感悟是同一的过程，并无孰先孰后的界限。但唯有人的“主体存在”感悟的发轫可以说才是人类文化的真正的萌芽，而“文化”概念的产生则应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堪称标志性的一个重大事件了。关于“社会”、“实践”、“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远远没有结束。不过，今天所达到的共识毕竟可以证明人类的文化离愚昧已经越来越遥远。这是足以令人鼓舞的。只是不能忘记，倘若没有一定水准的科学的“文化”概念，人类社会的进步就会变得不可思议。

其二，“文化”和“军事文化”概念的界定。

前文所谓“结果”、“对立”和“人化”，可视为关于广义“文化”概念的再抽象，如果加以具体地“还原”，那么广义的“文化”则是人类实践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其中的“物质成果”所以属于文化范畴，是因为它不是自然界提供的现成的东西，而是以其存在形态的变化表征着人的创造及其社会价值，表征着由自然存在物到社会存在物的质的飞跃。

我在《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若干问题思考提纲》^①一文中，曾有如下表述：“人们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形态的产品或活动过程及其结果中的精神的‘烙印’，都可以称之为‘文化’或‘文化现象’。”《军事文化学》一书则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创造能力、活动方式及其创造的精神成果（所有的精神产品以及物质产品中的精神因素）”；而军事文化当然就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人们在军事实践中所形成的军事创新能力、军事活动方式以及创造的精神成果（包括武器装备等物质成果中的精神因素）。国防设施、武器装备等物质成果只是军事文化的载体而不是军事文化本

^① 毕文波：《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若干问题思考提纲》，《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身”(见第一章)。以上两种关于“文化”的表述(以及学界某些其他有关表述)都是狭义“文化”的界定,而且是基本一致的,据此演绎的“军事文化”概念也应该基本一致。

两种狭义“文化”的界定都表明:文化的原初基础和载体是物质;文化发生、发展机制的基础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社会实践;文化的相对独立的“终端”形态是精神和精神世界。既然“精神”和“文化”如此同一,那么“精神”之外所以还需要建立“文化”的概念,主要是由于“文化”旨在强调精神借助于实践的中介而实现的对于自然物质的“人化”功能,强调精神的张力和感染性、渗透性、辐射性,亦即能动性,还在于强调精神表现的形式特征,等等。同时也正因为“精神”和“文化”如此同一,二者之间有时可以交换使用;至于作为语词使用的另一种分工,则又取决于言语修辞习惯的约定俗成,与概念本身的性质没有多大关系。

本书称“文化”和“军事文化”中包括“物质产品”或“物质成果”中的“精神因素”,是可以成立的。这里的“精神因素”当然不是像人的大脑中存在的那种机能、状态和特性,因此似可理解为某种精神的“烙印”或“印记”,它只是确认物质产品或成果的创造依据于人脑中的某种理念和设计。

本书(第一章)又指明文化“应该包括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创造能力和活动方式”,而限于实践创造的精神成果。这确实更加有利于避免将“文化”看作某种“博物馆”、“贮藏库”、“一堆创造物的堆砌”,以致忽略“文化”的活力及其来源。本书所称选择“文化”的狭义界定,但主张对根本性的问题“作宽泛的解释”,即在于此。并且实际上还产生了沟通狭义、广义两类界定的效果。应当说两类界定各有优长:在着眼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张扬主体的特殊定位上,后者更优于前者;而在着眼于互为主客体的人

类社会内部，揭示精神生活的特殊地位上，前者更优于后者。上述差别同时就反映出其间的某种相容性；而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广义的文化还是狭义的文化都依赖于人类实践的决定性作用。在常见的有关定义中，一般都是将实践的创造规定为文化的前提，但没有或不是十分明确地像本书这样，直接将实践的创造能力和活动方式本身规定为文化的内容。本书这种规定与其说适合于狭义的文化，不如说更适合于广义的文化。因为精神产品的生产仅有实践的基础还不够，多半还需要最后通过思维加工制作这一相对独立的环节才能完成；而按照一定的观念设计和一定的活动方式释放实践创造能力的直接结果，就是改变了原先的自然形态因而具有文化性质的物质产品，这是一个统一的、同时的过程，没有明显的环节之分。

依据文化系统内部子系统（或结构要素）的性质，广义文化可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物质性活动及其产品）两大类，进而可再分为思想文化、艺术文化、伦理文化、制度文化、语言文化、心理文化、行为文化、技术文化、物质文化（物质产品）等类别。狭义文化性质类别的确定，或排除上述某个（某些）类别，或将其纳入精神范畴作出特定的诠释，如物质文化被解释为物质成果中的精神因素（或烙印），技术文化被解释为技术理念和技术知识。与此基本一致，本书（第四章）按照狭义界定，将军事文化大致区分为军事思想文化、军事制度文化和军事心理文化三个层面（或三大类），有关论述也相当准确。

本书认为思想文化、军事思想文化是理性思考、自觉创造的结果，而心理文化、军事心理文化则处于习以为常、日用而不知的非自觉的状态。这个看法有助于把握高低两类文化的质的区别，其中在相对的意义上、在大略上对于心理文化所作的说明也是成立的。这里还可论及，心理文化、军事心理文化的性质和水平也有高低层

次之分。高级心理和某些感性认识由于受理性的主导性影响，往往介于自觉和非自觉之间，而且有的心理现象和感性认识中就直接融入了理性的成分。这正是人的心理和感知与动物心理的区别所在（现代科学还证明，高等动物的某些心理也可接近于人的心理，反映着动物进化的过渡性）。

其三，文化学、军事文化学的学科性质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文化学、军事文化学是关于文化、军事文化的本质、系统构成、功能、价值和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文化学、军事文化学都高度重视文化、军事文化的传播、交流和继承、创新问题（见第六章、第五章），这些都属于文化和军事文化发展机制的题中之义，有关研究当视为“发展”问题研究的重要“特写”。

一切科学都是最高层面的文化，因此都是文化学考察的对象；一切军事科学都是最高层面的军事文化，因此也都是军事文化学考察的对象。就此而论，文化学、军事文化学与科学学、军事科学学存在着某种重叠，不过文化学、军事文化学的考察对象还包括未进入科学领域的文化现象和军事文化现象，这就决定了文化学、军事文化学与科学学、军事科学学的理论构架并不雷同。文化学和某一专门科学都可能考察属于后者问题域之内的某一文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学观照的视域是包括该现象的文化系统整体，该专门科学虽然也需要联系相关的其他现象，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但主要是依据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同样，军事文化学和某一专门军事科学都可能考察属于后者问题域之内的某一军事文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文化学观照的视域是包括该现象的军事文化系统整体，该专门军事科学虽然也需要联系相关的其他现象，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但主要是依据本军事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另外，正如本书（第一章）所指出的，军事文化学既是军事学

的一个分支，又是文化学的一个分支，是军事学与文化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因此文化学对于军事文化学具有指导意义，军事文化学又可以给文化学提供思想资源。关于文化学的指导，固然也需要在充分的军事文化事实支持的基础上采取由“文化一般”经过演绎达到“军事文化特殊”的途径，但更为重要的是将文化学的方法以及其他有关科学方法加以转化，使之与军事文化学自身的方法相结合，统一运用于军事文化现象的科学分析，从军事文化实际中逐级概括出军事文化系统各个方面的和总体性的规律，或者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本书不少立论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尝试。例如论及军事文化结构与功能的历史辩证关系，认为军事文化功能的提高与军事文化结构的理性化、系统化程度相伴发展；军事文化结构中主导因素的变化与军事文化功能重心的变化密切相关；军事文化结构中各种元素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其功能的发挥也越来越依赖于多种元素的综合作用（见第四章）。论及军事文化发展的动力系统，认为该系统由科学技术和军事科学技术的强大推力、军事文化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平理想的永恒引力以及军事文化交流的外在拉力所构成（见第五章）。论及全球化时代军事文化的传播，认为它表现为以下特点，即军事文化传播媒介多样化、传播意识自觉化、传播环境复杂化、传播机构成熟化以及传播主体在一定渠道和程度上的个体化（见第六章）。论及21世纪军事文化的发展，认为其基本趋势在于：从表现形式上看，将不断强化信息化和数字化；从内容上看，理性化的色彩将越来越浓；从传播和交流上看，正在走向全球化；从军事与社会的关系上看，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将不断趋向一体化（见第八章）。论及军事文化的价值判断，认为应着眼于军事文化的军事作用和社会作用，包括效益判断、道德判断和历史实践判断三个方面或类别；历史实践判断是根本的纵横合一的判断，即要求把军事文化

置于一定条件下的历史坐标同时又是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上进行综合的实践结果的价值评价,判断某种军事文化对于战争、和平乃至人类社会进步产生了何种性质以及何种程度的影响(见第七章)。如此等等。应当说这些结论性的认识都是属于“文化的”,也是属于“军事的”,能够从中管窥军事文化学的学科容貌。

至于文化学和哲学,后者揭示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维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它和前者的区别显而易见。问题在于,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史。哲学历史观(历史哲学)的对象与广义文化学几乎没有多少区别,然而文化学(无论狭义还是广义)着力关注的是人类的创造及其成果,而哲学历史观所着力关注的则是作为创造和成果分配的条件社会历史形态,它对文化现象的重视、研究以及对文化学的指导也必然纳入这样的眼光,而且可以借助文化学的成果,不必在文化系统构成以及其他某些方面的分析上与文化学占据同样的比例。军事文化学与军事哲学也是如此。前者着力关注的是军事领域的人的创造及其成果,而后者着力关注的则是军事与社会、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是作为军事创造成果应用的直接归宿的战争与军事的整体形态,它对军事文化的重视、研究以及对军事文化学的指导也必然纳入这样的眼光,而且可以借助军事文化学的成果,不必在军事文化系统构成以及其他某些方面的分析上与军事文化学占据同样的比例。此外,文化学、军事文化学与哲学认识论、军事哲学认识论也颇为相似。后者重在揭示认识规律,为了这个目的也要顾及伴随认识过程的心理现象,但不必着墨过多;而前者对于人的认识的研究,虽然离不开过程机制的考察,但重在分析和评价认识成果及其创造的社会价值、军事价值和“人化”意义,而且它的对象广泛涉及包括认识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在内的一切心理现象、军事心理现象,以及其他文化现象。

同时还需要指出，文化学、军事文化学在文化、军事文化系统构成分析综合的基础上提炼、概括的规律性理论，其中某些基本理念和范畴又必然进入哲学和军事哲学；与其构成叠合的界面，而且该界面在所在层次范围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还可相对独立，形成文化哲学和军事文化哲学。

在人类科学体系中，哲学是指导一切的最高方法论，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除哲学外，军事哲学是军事领域中指导一切的最高方法论，只要研究和解决军事现实问题或历史问题的需要还存在，这一点也不会改变。然而，哲学和军事哲学也属于文化和军事文化范畴，是其中的一个要素^①，并不能代替整个文化和军事文化的作用和地位。不唯如此，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化现象是，某个国家（民族）、某个时代（时期）的文化和军事文化系统中，实际上真正居于核心地位，对整个系统产生决定性影响，从而成为该系统的代表、特征和标志的，既可能是某种哲学思维和军事哲学思维，也可能是某种伦理精神和军事伦理精神，也可能是某种政治主张和军事政治主张，还可能是某种宗教信仰和军事化的宗教信仰，还可能是某种科技理念和军事科技理念，更可能是若干类别某些文化要素的组合。而在有的国家的文化传统及其流变中，哲学和军事哲学始终处于贫乏的状态（已有西方学者对日本官方作出这样的判断）。所以如此，只能从特定历史条件的综合作用中探寻根缘。这样的现象和其中的规律无疑为哲学、文化哲学、文化学和军事哲学、军事文化哲学、军事文化学所共同关注，而尤以文化哲学、文化学和军事文

^① 这里存在着一个颇为有趣的关系：哲学的对象是宇宙，文化学的对象是文化，两个对象的外延不可同日而语；而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又是文化学的对象，文化学作为一门学问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因此又是哲学的对象，二者可谓互为对象。

化哲学、军事文化学为甚。

其四，文化、军事文化的反思和觉醒。

大约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兴起了新的文化研究的热潮，包括以“文化学”命题的各种著述迭相问世。尽管研究的目的和效果并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就其主流而言，我以为在颇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基于人类社会责任心和社会良知的当代新的文化反思和觉醒的表现。这种表现既可能产生于研究者对重要社会历史人物及其集体率先历史性觉醒和召唤的深刻理解、认同和发挥，也可能产生于研究者自己的社会观察。

人类文化之所以具有活力和生命力，是因为它的系统内部各结构要素之间以及文化要素、系统与社会、自然之间，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人们的思维对其中重大关键性矛盾的敏锐的、积极的反应（意识到矛盾的存在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即是文化的觉醒。它不仅是文化自身而且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强大牵引力和前端环节。具体地说，文化的觉醒包括从分析文化系统的内外现实矛盾出发，返顾、反思和批判陈旧、落后的文化现象，前瞻文化和社会的未来趋向，在此基础上建构推动文化和社会进步的某种整体性变革或建设的蓝图。其中，文化的批判至关重要。正视落后是进步的起点，一个没有文化反省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正因为如此，鲁迅不仅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的鞭挞，而且对于本民族国民性弱点的解剖，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经典的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当今德国政府对于纳粹德国及其法西斯文化的清算和对各国人民特别是欧洲人民和犹太民族真诚表达的歉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谅解；而日本极右势力至今拒绝承认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变本加厉地为战争罪犯和早已沦为人类文化痼疾的“武士道”精神扬幡招魂，不仅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也遭到日本人民的鄙弃。由于

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文化的觉醒与作为社会文化要素的军事文化的觉醒，不一定一一对应，但总的来说，特别是就较长的历史过程来看，二者之间或迟或早会发生相互影响和促进。

文化反思和觉醒应当是文化学和属于文化学学科体系的文化史特别关注的课题。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思潮，普鲁士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毛泽东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历史哲学、政治思想范畴和军事思想范畴的科学真理，等等，都是这样的令人惊叹的丰碑。纵观人类历史和文化史，影响最为重大的反思和觉醒，当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和全人类贡献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同时也包括科学的战争观。它指明了消灭剥削和压迫、消灭阶级和私有制并从而消灭战争的正确道路，预见了虽然遥远但最终必定实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彻底解放的灿烂前景。它是在凝聚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透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基础上，拨开层层迷雾，澄清种种似是而非，破天荒第一次创造的足以震撼旧世界、足以振奋人类良知的无比辉煌的科学思维的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下面仅列举四点。这些变化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因而实际上也构成了既错综复杂又带有某种整体性的文化景观。

一是苏联由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向争夺世界霸权，进而导致危机四伏（特别是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严重损害了国计民生），以至亡党亡国，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也随之衰微以至解体。这个过程和结局引起了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后来新建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各种强烈的思想反应。与此形成尖锐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自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借鉴苏联、东欧的教训，确立和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和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于这是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进行再认识的伟大成果，因而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划时代的反思和觉醒的特征。

二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大战的危机逐步转变为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8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论断。由于这是对国际形势重新分析和评估而得出的振聋发聩的结论，因而具有政治和文化的新的反思和觉醒的特征。

三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演变和发展的综合作用下，超级大国核对峙的僵局终于孕育出一个突破口，引发了一场世界新军事变革。变革的实质是通过军事信息化谋求军事打击的精确化和战争的可控化、有限化。一方面它为霸权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提供了新的军事工具，但同时也为避免大规模战争提供了现实的可能（20世纪80年代，苏联军事科学界甚至将预测的未来战争视为“文明战”）。在很大程度上，这又是政治军事战略家们针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就战争目的与手段、战争效益与代价的矛盾进行反思的结果，更是各国人民痛恨战争、切盼和平的强大舆论推动的结果。党中央、中央军委洞察这股不可逆转的国际军事潮流，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作出了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决策，确定了军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道路。这是捍卫国家利益、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维护世界和平所必需。由于制定和实施上述战略方针和决策，需要由长期坚持的打赢机械化战争的思维观念转变为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的思维观念，因而具有政治和军事文化的新的反思和觉醒的特征。

四是科学技术呈加速度发展的趋势，科技发展的方向和成果利用也加强了分化的趋势，一方面大幅度造福于人类，另一方面又在

军事等领域加祸于人类，严重破坏自然环境，造成腐朽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败坏和犯罪行为的泛滥，由此引发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等思想倾向的交锋，以至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名呼吁回到古代东方孔子那里去，有的权威国际机构也把孔子倡导的一字之道即“恕”道确定为人类道德伦理的基准。面对这一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抱定健康向上的追求，倡导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经济、科技、国防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民族、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共同发展，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与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为此竭尽全力。由于这是独树一帜地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弘扬“以人为本”的理念，也由于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推进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改造、利用和保护的统一，因而具有政治和文化的新的反思和觉醒的特征。

以上所述发生在中国的独特的创造，当然也包含着对于世界各国有关反思的合理内核和有益经验的参考。

凡此种种，无一不关系到当今和未来国家、民族和人类生存、发展的命运和福祉，关系到“自然人化”中的人文关怀，关系到整个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运行，从而为文化学和军事文化学提供了广阔的前沿空间。

这里不妨再重复一遍：以上涉及的问题是文化学和其他诸多学科共同瞩目的对象，而文化学研究的内容则侧重于主体面临客观世界的自觉创造、主体自身精神世界的构建和完善，以及二者的内在联系，方法上则强调将某一或某些文化要素置于文化系统中加以考察，强调着眼于文化系统的整体状态、发展和规律。文化学与其他诸多学科之间必然有这样那样的重叠，但不是相互代替或转而彼此隔离，而是彼此分工、相互协调和支持。

其五，当代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关键。

当代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建设，是前文论及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一个突出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第八章）从重要意义、“先进”的目标定位和建设途径三个层面作了系统阐述，对于我军各级领导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宣传、文化工作者明确规划、组织、指导和开展有关工作的总体思路，很有帮助。

从内容的角度看，需要牢牢抓住三个关键。

——具体地把握当代军事科技是当代战斗力系统主导性因素的观念及其应用的规律。包括搞清当代战斗力系统和当代军事科技系统以及后者作为主导性因素的含义和二者的互动互补；以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军事信息技术在军事科技系统中的领头地位及其与其他军事科技的互动互补；“主导性”观念对于各类各级信息化军队建设、军事斗争准备以及构建信息化人民战争形态提出的问题；“主导性”观念应用中面临的矛盾和解决的原则、方法，特别是如何形成广大官兵精神状态的保障条件；等等。强调“具体地把握”，就是防止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要求切实将这一军事文化观念转化为军事实践。而能否“具体地把握”就是检验官兵特别是指挥员是否真想“变革”、是否真想“打赢”的试金石，它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精神状态（当然“具体地把握”作为一个要求的有关规定性属于军事文化学的课题，至于该层面之下进一步的具体回答，则是各门军事学科的任务）。

——把我军官兵的道德境界提升到时代的水平。人民解放军的道德素质包括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的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爱军习武、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尊干爱兵、团结协作的精神，不怕困难、不畏艰苦、雷厉风行、顽强拼搏的战斗精神，热爱科学、钻研技术、开拓创新的精神，遵纪守法、讲军容、讲礼貌、讲作风、讲文明的自觉精神，